

Book

告别大国小民 争当强国大民



《怎样做大国》薛涌著 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陆燕青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于大国、强国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经过此轮“大浪淘沙”,中国的表现,令全球刮目相看。虽然西方媒体对中国五味杂陈的热评,对中国经济实力刻意强调不无炒作之嫌,但从美国政府不断要求中国增持美国国债,以缓解华尔街的金融压力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全球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大国未必能够与强国划上等号,而真正意义上大国,同时也该是强国。以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离强国的概念还有很大距离。

自十四世纪以来,在人类前进的“马拉松”比赛中,相继跑出了九个世界性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这些国家的成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既有国民素质、开拓精神的因素,也有某些历史性机遇的缘故。

有这样一段典故,战胜法国并俘虏法国皇帝的普鲁士元帅毛奇曾讲: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另一个典故是,拿破仑因为镇压海地人民的起义失败,临时决定将北美的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使美国的国土面积随即翻了两倍。这两个“故事”,犹如铜板的正反面,正折射了成就大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海啸中大为提高,不仅是因为30年来的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也得益于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世界工厂等外在“运气”。如果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薛涌先生的这本《怎样做大国》,正为此勾勒了一个“大国梦”的框架。

薛先生紧紧扣住时代脉搏,从经济和社会这两大方面展开论述。经济学方面,他主要从财富、能源、金融、住房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学方面,薛先生把教育、文化作为成为大国的充分条件。在重点阐述的民族素质问题时,着重解剖“大国小民”综合症。

今天,中国人正在重拾信心。可以说,160年来,中国人还不曾像现在这样自信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08年中国的GDP达到44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44万亿多美元)和日本(49000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36000多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201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从“大国”提升为“强国”,民众如何从“经济小民”成为“经济富民”、“法律富民”,已经是一道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紧迫问题。“强国梦”不仅是中央政府的使命,也是全体国民的职责。大家想必都记得,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刮到最凶猛的时候,韩国国民自愿排队捐献黄金,以充实国家金库,表现出了一种令人刮目的“外国大民”精神。而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时,全国人民以及全球华人慷慨捐款的义举,中共党员以“特殊党费”形式支援灾区的举动;上个月大陆各界捐款给受到严重灾区的台湾同胞的行动,也已渐渐凸显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外国大民”风范的雏形。

但中国走向强国的路程,注定是漫长的。在中国GDP总量超越英美德之际,以美元面值计,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300多一点,在179个被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04位。”薛先生特别提请大家注意,中国的发展是经济改革优先,百姓的基本权利还未能得到充分保障,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渠道,让普通公民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有足够的发言权、参与公共决策。

薛先生的关注点是大家每天的生活: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不管你生活在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还是在甘肃、贵州等落后的内陆地区,你最大的不安全感从哪里来?究竟是外国军队入侵、自己马上成为亡国奴?还是生了病去不起医院、干活拿不到工钱、下矿井一去不归、退休后丧失了生活来源,或者房子被人强制拆迁?”这样的关注表现了一位学者的勇气与睿智,以及强烈的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而对建设金融中心,薛涌有另一层思考: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只能当美国的金融殖民地。所以,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不仅是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之必需,也关乎国家的安全。但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必须摆脱廉价的民族主义,根据金融市场的信号来确立自己的发展战略。所以,中国在营造世界金融中心的软环境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而言之,具备必要条件加上运气,或者能够成为“外国大民”;而成为“强国”的条件则更加苛刻,除去必要条件还需拥有充分条件。我们只有在“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指引下,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以一顆平常心来“科教兴国”,才能将目前的规模型发展,提高到质量型的发展,而全民素质的提升是“强国梦”的关键与核心!



王石为什么 要去耶路撒冷



◎黄亚明

乍一看书名《徘徊的灵魂》,以为是行吟诗人在大地上沉思,细看作者原来是房地产赫赫大王万科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据说喜欢探险,热心环保和公益事业。这么说,这是本献给商人的书,或者说献给有钱人的书。这不是在鄙薄有钱人的原罪,我的意思是,中国有钱人的社会责任记录太差,更别谈接近诗人的心灵,才有了这份不寻常的意义。

《徘徊的灵魂》集结了王石朝圣耶路撒冷的随想,有关万科及地产业的一些散论。套用评论家的时髦用语,它披露了两种现实,即:当下中国房地产的现实,作者王石的心灵现实。

有记者曾为此采访过王石,提问涉及新书有内敛、收缩的感觉,像是在自省、在慢下来,似乎与中国大企业的领军人物一贯“求大”“求快”的做派不相吻合。王石的解释是,“慢下来”,是因为我们不仅要看到未来,看到更远的地方,也要回顾过去,要看得更清楚。王石说,写一本激情四射的书,说说理想、成功、韧性,再加几个小失败做点缀,这很主流。但我们更需要“慢下来”:不能看清楚过去,也就看不清往何处去。

这说明王石头脑还是清醒的。以我有限的阅读来看,企业家不加节制地鼓吹产业膨胀、扩张,步伐迈得太快,导致结局惨痛者多有其人。联想在该书序言中,王石坦言,之前数月,经济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了应对金融海啸,纷纷采取积极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流动性充足,带来通胀预期,大量投资流向房产、股市,资产价格上涨。”再联想到市场的集体兴奋似乎与2007年夏季的狂躁十分相像,而就在2008年秋冬之交,王石抛出的“拐点论”,在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准确,我们不难觉得王石的“另类”,是建立在充分调研、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的。

王石在书总结说:国际经验证明,市场下行通常由五大因素驱动:经济衰退、红利减弱、本币升值结束、银根紧缩、强制增加供应的政策。”对当前楼市,王石认为,只有认识市场规律,才能探寻企业未来,其中“不贪婪”至关重要,短期看,市场永远有很多不确定性。”当然,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逐年上升,加上居民财富的增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给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大环境。”这是刺猬式慢行的王石和万科,穿满自保的“盔甲”,以备安然过冬。

书中王石还特别崇尚“工具理性”一语。他阐述工具理性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在商业社会中,可以理解为目标明确,途径精确,操作具有精确性和可衡量性。与之相对的是价值理性,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价值,强调动机纯正,选择正确手法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王石分析,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的结果。当然,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逐渐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带来了人的异化和物化,这是西方现代社会面临的难题。但中国企业家的行为,与我们身处的社会背景和传统文化分不开,中国人的思维缺少工具理性,传统上习惯于价值理性,故此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首要的是解决如何建立工具理性的问题。

那么,耶路撒冷与王石,与中国房地产市场何关?我想,游走王石有机会接触世界的各色人等,也能了解一些世界历史,不过显然更重要的是,房产市场的起伏跌宕,使得王石精神上彷徨、无告、茫然,需要一个支撑来体现自我的生命价值、企业价值,来探索追寻精神的源头、理性的本质。

所以,与其说是王石选择了耶路撒冷,不如说是耶路撒冷给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人,提供了一个向内的入口。当灵魂在那个圣地徘徊,不仅代表万科老总,更是对无数曾在暴力中打滚的商人的善心提示:放下身段,与民共舞。这,正是《徘徊的灵魂》的核心价值,也许是所有企业的最终出路。

在大时代坐标上解读中国密码

张五常最新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下月出版

知名国际经济学家张五常最新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简体中文版即将出版。

作为张五常对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制度潜心研究收获的结晶,本书凝结了近几十年来他长期深入调查和思考的成果。张五常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致力于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研究。他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

个庞大的合约组织,提出了中国地区竞争的特点是县际竞争,并对由县一级行政区划引发的经济现象做出了合理且详细的论述。面对今天纷繁复杂的新时代转变,张五常清楚地看到目前全球发展的重点依然是如何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一再强调中国在这个转变中所起的示范作用。



斯高度评价本书在理论上的创新以及所达到的深度。(蒙)

国庆专辑

《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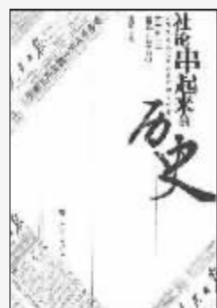


孟云剑 杨东晓 胡腾 著 中信出版社 2009年1月出版



李翔 著 中信出版社 2009年1月出版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



袁晔 著 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出版

《中国生活记忆》



陈煜 编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年8月出版

陷入极端悖论时,你将怎样抉择

——评迈克尔·舍默《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

◎潘启雯

假设有十个孩子跑到铁轨上玩耍,九个选择新铁轨,一个选择旁边的旧铁轨(特殊情况基本不用)。孩子们玩得正开心,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朝着九个孩子的方向失控撞去。这时,你会扳动道岔,把列车引向只有一个孩子的旧铁轨吗?换一个假设场景,失控的火车又一次呼啸而来并即将撞死前面的九个孩子。你会把身边的大块头男人推到轨道上,让火车因为撞他而停下来吗?同样是为了九个,牺牲一个,但大多数人会对前者说“会”,对后者说“不”。两种假设情境的道德计算相同,从逻辑上说答案应该一样,但为什么我们的感情却不这么看呢?

在《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里,《科学美国人》专栏作家迈克尔·舍默博士把每位读者都置于这样的“极端的悖论”之中。在舍默看来,我们之所以会陷入前述的矛盾、不安,以及无所适从,正是因为对于人类而言,与自己一般无异的活生生的“人”和冷冰冰的“扳道岔”截然不同。在进化的设计中,我们看重人过多“非人”,看重亲属多过非亲属,看重朋友多过陌生人,看重圈内人过多过圈外人,看重直接行动多过间接行动,这些直觉感受到的差异和道德本能反映了一种我们在数万年进化出的理性计算。”

较之于人类两足着地、运用大脑、形成意识的进化,较之于火、印刷术、互联网的发明,较之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数字革命的第次发生,经济上跃进的幅度是最大的。而且,正如我们所知,对于那些最富裕国家的富裕人口来说,这一飞跃速度还要快得多。如果我们把10万年的漫长历史压缩成短短的一年,那么,最近相对繁荣的250年,只相当于不到一天的时间。简单地说,在人类历史的前9万年时间,我们在几十或几百个人的小群落里以捕猎采集为生而不断进化出来的心理状态,并不总是适合推理当今世界的人类行为方式。当下看似不合理的行为,或许在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结束前都非常合情合理。反倒是那些脱离进化论角度的观点,那些认为“经济人”自私、理性而自由的观点,那些把经济学视为关于理性计算、最优化选择的“沉闷的科学”的观



《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美)迈克尔·舍默著 阎佳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

点,根本讲不通。那么,数十亿人的个体活动何以能最终产生文化的集体现象?社会性的协作、利他、仁慈、同情,何以能抗衡本最适合个体生存和繁殖的自私、自利、贪婪、竞争?为什么富有不能等同于幸福感?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能建立信任并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才能达到社会和谐?为什么我们的错误决定总是与钱有关?

在舍默看来,要取代业已存在并被广泛接受的事物,必须克服个人和历史的惯性;技术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是根据功效和历史来锁定其形式与功能的,并不是单靠“是”、“否”、“好”、“坏”来决定的。于是,要科学地解释上述问题,我们应当用进化论阐释人类经济怎样从“猎捕—采集”进化到“消费—贸易”,即回答“市场是怎样产生意识的”;然后我们应当用心理学剖析人类大脑怎样适应于这一经济形态转变,即回答“意识是怎样在市场里运作的”;最后我们该如何驾驭“经济学、生物学和心理学大碰撞”,研究道德情感怎样进化得让公平、互惠、交换、贸易与信任在不断的良性循环中得以发展,即回答“意识和市场是怎样形成道德的”。

比如某个银行家,有笔可供借贷的款项,如果借给信用记录差的人,他冒的风险太大,那些人很可能不还款,弄得他破产。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局面:最需要钱的人,信用风险都很大,因此得不到贷款;而最不需要钱的人,信用记录最好,因此能得贷款。这就呈现出“富者愈富”的局面。进化心理学家约翰·托比把这种称之为“银行家悖论”,并将之应用到更

为深入的进化问题上:我们该和什么样的人深化友谊?舍默认为,这类似于我们原始人祖先要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适应性问题:倘若一个原始猎人处于急需援助的境地,他的“信贷风险”就变大了,出于这个理由,他很难获得援助。“如果我们把生活看成是经济学,又如果我们把帮助别人的东西(尤其是友谊)看成是资源,那么,按照“银行家悖论”,我们必须评估相关人等的信贷风险,做出艰难抉择。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利他主义是这里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或者,更技术化地讲,为何利他行为降低了我们自身的“繁殖成功率”,同时提高了他人的“繁殖成功率”?标准理论为利他主义提供了两条进化道路:选择亲属和互惠利他。帮助自己的亲属,帮助愿意回报我们的利他行为的人,等于是我们在帮助自己。”舍默由此推断,进化选择了那些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的人。

当然,这有个限度。由于资源有限,我们不可能帮助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评估信贷风险,信用风险的差异随即产生。这就再一次出现“银行家悖论”——仍然是最需要援助的人最难获得援助。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酒肉朋友”可能会假装出利他的样子,等真正处于恶劣环境时,他们根本不带我们的忙。而真正的朋友,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深切关心我们的安危。环境越是糟糕,拥有真正的朋友就越重要。

市场同样是不断进化的,随之进化的,还有人的行为,而这些进化的行为让市场具备了某种“心理”——舍默所提出的这一解释经济行为的全新方式,事实上将复杂理论、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和道德理论等大量互有关联的前沿科学理论成果,统统划到演化经济学的范畴,也即把经济看成一套不断进化的复杂适应性系统来研究”。当下,虽然我们还不曾说,舍默即将开创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但他将经济学与生物学、心理学的融合在一起碰撞、探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经济行为的方式,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这两位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年开始研究“前景理论”时,谁能预料到他们会有后来的斐然成绩呢?